

〔苏〕雷巴科夫 著

阿
尔
巴
特
街
的
儿
女

湖南人民出版社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ДЕТИ АРБАТА

Из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 № 4, 5, 6 1987 г.
(根据苏联《民族友谊》杂志1987年第4.5.6期译出)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

〔苏〕А.雷巴科夫 著

石慧芬 等译

责任编辑：郭锬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375 插页，6

字数，606000 印数，1——20850

ISBN7—217—00269—9

I·113 定价：5.85 元

湘人：87—10

文学对历史的深沉思考

——雷巴科夫新作随笔

郭铨权

今岁暮春时节，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区新修复的花坛里，姹紫嫣红的丁香绽开花蕾。一群莫斯科男女大学生在花丛中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莫斯科人亲切攀谈，阵阵笑语欢声荡漾在这条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街区上。他就是雷巴科夫。76岁高龄的苏联作家雷巴科夫以顽强的毅力，诚实的劳动拨亮了自己文学生命的油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的问世使作家再一次赢得了读者。

“引爆了一颗文学炸弹”

世界舆论界认为，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当今描写30年代事件的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是今天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带来的文艺“复兴”新气象。雷巴科夫这部作品深刻反映了1934年苏联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洛夫被杀害，国内大规模的肃反和镇压。肃反扩大化给苏联人民蒙上了阴影，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后，斯大林大权独揽，个人迷信逐渐蔓延。斯大林对他所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领导层，如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洛米纳泽，以及国家高级官员布加金，

一些反对派成员雷日科夫、毕亚达科夫、克里沃卢奇科等采取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秘密警察不受法律约束，制造了一桩又一桩草菅人命的冤假错案。

斯大林同30年代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的基洛夫的尖锐矛盾和冲突，最后以这位忠于党的事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被谋杀告终。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1911—）是苏联作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高手之一。这位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作家早期的作品多为儿童题材和生产、道德题材。1951年，因长篇小说《司机》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今为苏联国家文学奖金）。雷巴科夫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短剑》、《青铜鸟》（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合集出版）、《叶卡捷琳娜·沃罗尼娜》（1955）、《沉重的黄沙》（1968）、《阿尔巴特街的枪声》、《克罗什历险记》（1960）等作品已先后被介绍到我国。中篇小说《无名小卒》荣获1973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雷巴科夫的作品致力于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严肃思考，通过行为、事件揭示人物性格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层次，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文学魅力。他的许多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是雷巴科夫创作的三部曲的首部。另两部将是《一九三五年及其它年代》和《一九四四年》。明年，作家将在莫斯科发表他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三五年及其它年代》。

严格地说，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还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佳作，主要通过一些年轻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反映苏联30年代初期（1932—1934）的历史现实。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

是写莫斯科一条古老而闻名的街区——阿尔巴特街上的男女青年萨沙、瓦里娅、尼娜、尤拉等的命运，其中主要是写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审讯、判刑并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年轻大学生萨沙的命运。而这些少男少女的命运又是和整个苏联国家的政治生活分不开的。因此，小说的另一条线便是描写苏联上层人物的矛盾和斗争，主要写了斯大林独揽大权而对基洛夫等老革命家的猜忌、怀疑和迫害。小说除塑造了萨沙、列娜、老布尔什维克布佳金、肃反工作人员别列津等诚实、正直、无限终于革命事业的人物形象外，引起苏联和世界强烈反响的是对斯大林的形象塑造，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极为细腻的心理描写。

雷巴科夫于50年代末便动笔写这部小说，并于1966年将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的第一部的手稿寄给当时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新世界》杂志的主编A·特瓦尔多夫斯基。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欣赏这部作品，也想在杂志上发表，但由于种种干扰，未能如愿。雷巴科夫得知作品未被采用，又开始撰写小说第二部。1978年，小说第二部脱稿，雷巴科夫将手稿寄给苏联又一家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十月》编辑部，又遭到同样的命运。作家的妻子失望了，不相信小说还有与读者见面的可能。然而，雷巴科夫仍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终于在1982年完成了这部惊人之作。

“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

随着苏联国内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去年六月召开的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以来，苏联的文学创作和出版方面都发生了

令人瞩目的变化。一些大型文学杂志竞相发表了一批著名作家撰写的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有争议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民族友谊》(«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第四、五、六期连载了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随后，苏联作家出版社于今年8月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虽印数在百万册以上，仍不能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美国一家出版商以10万美金从作家手中购到版权，独家在美国出版英译本。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在公开发表前，作家的手稿已经在苏联文学界广泛流传，许多作家争相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塞格·施迈曼曾在1986年报道说：“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文学艺术自由开放时期，苏联作家A·雷巴科夫1987年春天要引爆一颗文学炸弹：他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即将问世……这部作品将揭露被歪曲的历史真象，并打破30年来的沉默局面。”

苏联文学界对雷巴科夫的小说反响强烈，认为它是一部“不打哑谜的历史画卷”。有的作家认为这是一部“研究小说”，所研究的对象是时代，认为雷巴科夫的作品是“用从容的现实主义画笔描绘的规模宏大的社会历史画卷”，填补了历史地图册上的一个“空白点”。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认为，雷巴科夫用顽强和毅力，成功地填补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空白点”。当代苏联著名作家贝科夫、卡韦林、格拉宁、巴克拉诺夫、叶夫图申科、康德拉季耶夫、奥库查瓦、卡里姆、沙特罗夫等人读过小说手稿后，纷纷给作者写信，给《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以高度的评价。贝科夫说，小说对30年代的社会生活作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剖析，写了许多过去在文学上从未反映过的东西，而“最宝贵之处在于写这一切是站在真理的立场，不掩饰，不辩解，不回

避那些复杂的、可怕的、实际上是犯罪的东西”。卡韦林说，小说不是要同谁争辩，也没有驳斥任何人或者给时代“抹黑”，“小说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讲出真理。”“在苏联文学中，我还没有读过为了如此强烈的要讲出真实情况的愿望而写出的另一部作品。”格拉宁认为，小说是否应当发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党的二十大及其决议的问题。如果认为（苏共）二十大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必需的，那么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就应当发表。小说对待历史是诚实的。巴克拉诺夫认为，小说塑造得最好的形象“是时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斯大林，是在20年后被称作‘个人崇拜’的那些东西”，应当让没有经历过这一历史悲剧的年轻人了解悲剧的原因，它的“根子在哪里”，而通过《阿尔巴特街的女儿》这部小说可以得到清楚的了解。叶夫图申科也认为，“对30年代的悲剧保持缄默会使年轻一代不自觉地把那个年代理想化而对现实不满。只有让年轻一代知道痛苦的真实情况，他们才会珍惜已发生的变化”。康德拉季耶夫称赞作者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斯大林形象。”认为这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卡里姆在写给作者的信中说：“坦率地讲，在读到小说的某些地方和某些细节时，有时我不得不强忍自己的内心抵触。您要明白，我和您一样，也是在那个时代的热情和信念中成长起来的。然而，问题不在这种主观的接受与否，而在于您所遵循的是客观真理。”

是什么动机促使作者勇敢地触及这个被认为是敏感的，甚至是禁忌的问题？作者认为小说反映的时代是了解现代生活的一把钥匙。历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创举，也有过悲剧。有些时期令人骄傲，也有些时期令人羞耻，但必须回顾，必须自省，目的是为了不重复过去。雷巴科夫认为，70至80年代的停滞现

象并非从天而降，而是30年代出现的某些现象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的继续。在那些年代里，在那种环境下，人们不敢独立思考，个人和个人意志主宰一切。人们失去了主动精神和尊严感。作者认为，在真理中培养成长的人追求真理，而在虚伪中成长的人只会按固定的标准思考，而且常常怀疑真理和事实的可靠性。因此，必须用真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了解历史的真象，因为青年是历史的继承者，开拓者和创造者。

对历史进行反思，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教训，从中悟出真理，更稳健地沿着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迈进，这是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重要意图。雷巴科夫说，30年代，“人们变得什么都怕”，不敢独立作决定，一切都等着看“上面”怎么说。这种“千万别出什么事”的恐惧心理至今存在，对我们的事业危害极大。雷巴科夫说：“现在，党正竭力首先在全国造成一种新的心理状态。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公开性。既然是公开性，就需要对一切都讲真话。首先是讲历史的真话。用虚伪的历史欺骗人，用谎言和似是而非的真理教育人，是不会有any好处的。用似是而非的真理教育出来的社会是没有道德的。”

作家把《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得以公开发表归功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雷巴科夫说：“如果没有1985年3月，读者也就看不到这部小说。”雷巴科夫在小说开禁后还表示：“有必要让人了解过去历史真象。人们肯定地认识到，只要不消除专制对我们人民心理上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前进。如果我们希望真诚地、真正地生活，就必须重视过去。我们再也不能让下一代在谎言中成长。”

有位作家提醒作者，不要忘记斯大林领导国家30年，卫国战争中4年担任三军统帅，而列宁领导国家只有6年。事实是斯大林并没有真正领导国内战争，是人民战胜了入侵者，而那些参加并赢得战争胜利的许多战功赫赫的军事将才后来却被斯大林消灭了。不应低估人民的力量，把胜利归功于一个人。只要个人迷信的后果尚未消除，只要人们不善于独立思考，就难以前进。现在国家需要新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苏联出版后，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苏联报刊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评论和读者来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多数读者对小说均持肯定和赞扬的立场。有些读者还以自己在30年代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来证明，这部作品公正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尤·伊达什金在苏联《文学报》撰文《为了未来而写过去》是一篇受到苏联文学评论界重视的文章。伊达什金在评论文章中说，尽管雷巴科夫的个人命运极为艰辛，但他在塑造斯大林的形象时并未失去客观性。有些地方，比如在描写斯大林对索菲娅·彼得罗夫斯卡娅的爱情时，读者甚至可以感觉到雷巴科夫对这个终身孤单的人的某种同情和怜悯。而这种客观的描写，正是过去和现在某些描写斯大林的作家所缺乏的。

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形象在苏联文学、电影、戏剧中出现累见不鲜。但是，苏联文学评论家认为，与过去的许多作品不同的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的作者头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使自己的主人公更加接近历史人物的真实。作者不仅描写了斯大林思维的内在发展过程及其哲学观，而且描写了他的世界观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东西。

一部争议之作

在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至今仍然存在争论的今天，《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书中有关斯大林的描写是否能为所有苏联读者接受？非也。一位苏联读者写信给苏联《文学报》说，以为雷巴科夫所塑造的斯大林的形象能为所有的人接受，那未免太天真了。因为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一直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关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直至今日争论也没有平息。因此，也有读者对这部小说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谴责作者是在“搅浑水”，是在“哄骗青年人”。历史学家И·帕尔霍缅科在写给《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将是历史上的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将会有许多困难、牺牲和错误的论述，质问编辑部“为什么所有的失误、困难和牺牲都应当算在斯大林的帐上”，提醒编辑部不要忘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准低下和整个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包围这一客观环境，不要今天来搞“事后聪明”。列宁格勒一位女职员给作者写信说：“我认为这本书是有害的，不公正的，包含着作者对国家历史的主观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对那些不太了解1917年至1956年这段历史的年轻人有害。”她谴责雷巴科夫是用个人的遭遇而泄私愤。利沃夫市一位读者甚至认为这本书是“雷巴科夫同志送给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敌人的一份礼物。”

雷巴科夫是怎样看待个别读者的不同意见的呢？今年七月份一个月，《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和作家本人就收到500封读者来信，还有不少读者从远道而来，要求会见雷巴科夫本人。

作家说：“我原来就确信会有人反对这部小说，但万万没有料到，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此之少。每百封信中持反对意见的只有5至7封。使人为之吃惊的是，这些信中有许多是不署名的，也就是说，写信的人还信奉那些老框框，时至今日还怕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他们不明白今天已不会因讲出自己的想法而蹲大牢或被流放了。”至于那些正面谴责作者贬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人，雷巴科夫说，我不仅不责怪他们，相反，我很同情他们——对那些不敢面对真理的人，我总是怜悯的。这类来信有两个主要论点：一是牺牲不可避免，二是不能只怪斯大林一个人。第一个论点没有人性。第二个论点不合乎实际，难道不是斯大林在全国造成的一种可以无视法纪、恣意妄为的情况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既导致了大量的无辜者的牺牲和损失，也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而最可怕的是，导致了道德上的损失……当一个人代替举国百姓去思考的时候，普通民众便不再去独立思考了。当一个人代替所有的人作决定的时候，人们便不再独立作决定了。当几乎是任何事情都被宣布为是斯大林同志倡导的时候……普通平民百姓还能倡导什么呢？

对于作品引起的不同争议，作者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名字是同反法西斯胜利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同他们身上的伤疤连在一起的时代。在动荡的年代里，领导人的名字总是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有时甚至变成神话和传说。然而作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集中了时代各种矛盾的人物。他精力充沛，善于动员人民实现既定的目标，为国家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 he 不想把斯大林描写成安琪儿的化身，而是描写成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有卓越功勋和重大过失

的领导人。

雷巴科夫为撰写《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一书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但他并不想辍笔，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三五年和其它年代》将于1988年问世。他说，这将是“一部沉重的小说，沉痛的年代……要把当时发生的事都写出来是很复杂的，心理上很复杂，但是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完成它，已经讲了真话，就需要讲到底……”《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一书只写到1934年党的卓越的领导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杀害为止。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三五年及其它年代》写了苏联肃反运动。这一扩大化了的运动，使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作家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定名为《一九四四年》。三部曲的主人公将延续下来，斯大林仍将是三部曲中的重要人物。书中事件的时间表将延续到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深沉的历史反思

文学对历史事件的深沉思考和痛苦反思，回答历史上重大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疑团、困惑，必将推动历史前进。30年来，当代苏联文学中有许多开卷有益的作品。

1953年3月，担任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职务达三十多年之久的斯大林逝世了。翌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了描写斯大林时代的中篇小说《解冻》。1956年，苏共二十大明确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尼林的中篇小说《残酷》、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单是为了面包》、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征途中的战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反映斯大林时代的错误政策、集

中营生活、官僚主义等社会问题的作品纷纷出现。这就是西方研究者们所说的“解冻”文学。

进入60年代后半期之后，反映斯大林时代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文学作品几乎绝迹。但是1985年以来，苏联文学界又出现了一股对斯大林时代进行再反思的潮流。率先在创作中重新提到斯大林时期的，是被称作“进步的领袖”的诗人叶甫图申科。他在1985年9月发表的长诗《禁忌》中，描写了50年代初苏联保安部门的首脑贝利亚。诗人指出，“还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尽量不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这名字太令人害怕了。”针对苏联社会中出现的对斯大林的评价上升的现象，叶甫图申科说：“谁忘掉昨天的牺牲者，/他就会成为今天的牺牲者。”“不可能有一个人的正义的铁腕，/而只有全体人民的铁腕！”

1986年中，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学作品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悲伤的侦探故事》、贝科夫的中篇小说《采矿场》、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地下海》、贝克的长篇小说《新任务》、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死刑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了或牵涉到斯大林时代。

1987年以来，以斯大林时代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根据记忆的权力》、格拉宁的长篇纪实小说《野牛》，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白衣》等。

为什么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会有这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反思斯大林时代呢？这是因为今天的苏联社会面临着与50年代初相类似的形势：从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主要领导人又重复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固步自封，喜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个人迷信时期的做法又在社会上蔓延，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阻碍了社会进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

形式的迷信对人民都是危险的”（阿勃拉莫夫语）。近几年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文学作品既是对苏联社会真实观察的记录，又是苏联人民要求改革、进步的心态的表现。

文学史上不乏相互类似的现象，但任何一个文学史现象都不可能是以前类似现象的简单重复。80年代苏联描写斯大林时代的文学作品与所谓的“解冻”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

所谓“解冻”文学的作家大都从人道主义出发，刻意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政策错误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80年代苏联作家在描写斯大林时代的社会问题时，则更加重视挖掘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根源。例如，在《白衣》一书中，作家通过受斯大林宠信的学阀里亚德诺院士与青年学者杰日金的冲突，表现了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苏联遗传学界摩根学派科学家所遭受的打击与迫害，并揭示出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政治上的“左”倾路线，思想上的唯心主义，道德上的利己主义。

对于“解冻”文学的作家来说，斯大林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毕竟还是“昨天”的事。所以他们是把这一时代作为当时的现实写的。而在80年代的作品中，斯大林时代才真正作为历史阶段，在同它以前及以后的历史阶段的联系和对比中，得到了较深刻的描写；斯大林政策的错误也从历史根源与对以后的影响上得到了更为尖锐、深刻的分析。例如，中篇小说《采矿场》的主人公在地下工作中怀疑正直的乡亲、忠诚的战友，渴望表现自己，以致断送了心爱姑娘的生命。而造成他对人的不信任的，是20年代以后由“左”倾思想指导的某些政治运动。在长篇小说《死刑台》中，70—80年代的社会邪恶被看作是斯大林错误的历史后遗症。小说中，狩猎队的“头儿”残酷地用暴力

手段对待不同意见的下属时，所重复的正是肃反扩大化时的论调：“……斯大林说：“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是应当彻底消灭的……你以为斯大林不在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构成80年代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文学潮流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已故作家的遗著。例如普拉东诺夫的《地下海》、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根据真理的权利》等都曾在出版机构压了几年，乃至几十年。尽管它们写在80年代以前，但由于它们表达的思想、感情、情绪与今天的苏联人是相通的，所以它们的问世也引起了苏联读者和文学界的强烈反响。

近几年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是苏联社会生活趋向改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文化官僚主义和“图解文学”的一种反抗。所以作家们在尖锐地提出具有迫切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时，都努力追求各自的独特、有力的表现形式。例如，普拉东诺夫在《地下海》中就运用了荒诞手法来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性的改革者们的背乎情理的做法。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中，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作品的结构也较自由、开放。但是其中确有堪称文学名著的作品。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文学理论家苏罗夫采就把贝科夫的《采矿场》、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称作第一流的杰作，并预言它们将对苏联的各民族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些描写斯大林时代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苏联领导方面与学术界的支持。不少政府官员与学者认为，反思斯大林时代“是为了不再重复失败和错误”，这种“现实地评价我们的问题”的做法是“苏联社会变得强大”的结果。然而，与50—60年代“解冻”文学中某些作品一样，近年的某些作品中也存在着全盘否

定斯大林，把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同斯大林的错误一起加以批判的现象。对此，苏联一些领导人、作家及读者发表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历史学家维·基谢辽夫认为，必须正确区分斯大林的功过。他还科学地指出：个人崇拜的“基本原因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个人崇拜及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是压迫、贬低人的尊严的旧社会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一次反扑”。这些批评与议论显然借鉴了50—60年代“解冻”文学的某些教训。

“填补历史‘空白点’”

苏联社会面临史无前例的改革。公开性给社会和文学创作带来了活力和繁荣。社会舆论在清醒地对历史进行反思。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近多次指出，苏联的历史不应该有空白点。历史学家、文学家、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和专著里十分活跃地研究和探索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空白点”，这一切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深切关注。

最近，《莫斯科新闻》周刊（1987年第49期）刊登了布哈林的绝笔信，这封信的底稿已被焚，是布哈林夫人靠背诵记下来的。从这封绝笔信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30年代肃反扩大化给无产阶级政党、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的重大损失和沉痛教训。这曾与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在苏联文学艺术作品中、在历史著作的编年史中看到的布哈林判若两人。文学艺术大师，史学家和一切善良的人们从这封绝笔信中可以悟出这样一个真理：草率地对待历史和文学，只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难以洗刷的耻辱和无形的心灵伤痕。布哈林在绝笔信中写道：

我即将离开人世。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因为它虽然是无情的，但却是神圣的。我感到在地狱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它运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可怕的力量，制造有组织的诽谤，行动大胆而自信。捷尔任斯基不在了。契卡的杰出传统逐渐丢失，当初，契卡的一切行动有革命思想指导，对敌人残酷无情，维护国家利益，不让一切反革命侵犯。因此，契卡机关受到特殊的信任，赢得特别的荣誉、威望和尊敬。

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党员都可以被研成粉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要是斯大林对自己不那么自信的话，本来是马上就可以找到证据的。党内乌云密布。我那颗毫无罪孽的头颅，会招致几千颗无辜的头颅落地。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布哈林的组织，尽管这种组织不论是现在，在我同党毫无分歧已近7年的时候，还是过去，在右倾反对派年代，都根本不存在。

我18岁入党，我一生的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几天，那份带有神圣名称《真理报》的报纸，刊登极其卑劣的谎言，说是我布哈林想断送十月革命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这是谎言，其无耻和不负责的程度就如同说“尼古拉·罗曼诺夫（俄国末代沙皇——编者注）毕生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政体、争取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的话，但愿后代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列宁更严厉。我们当初是头一个奔向这个一致的目标，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当初时代不同，习惯也不同。《真理报》登过辩论文章，老是争论、探索，